

近代日本的 东亚战略和政策

Jindai Riben De
Dongya Zhanlüe He Zhengce

米庆余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近代日本的 东亚战略和政策

Jindai Riben De

Dongya Zhanlüe He Zhengce

米庆余 著

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:乔还田

装帧设计:徐 晖

责任校对:张 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/米庆余著.

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7.8

ISBN 978-7-01-005520-6

I. 近… II. 米… III. 日本-对外政策-东亚-研究-近代
IV. D831.3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0598 号

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

JINDAI RIBEN DE DONGYA ZHANLÜE HE ZHENGCE

米庆余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16.25

字数:375 千字 印数:0,001-3,000 册

ISBN 978-7-01-005520-6 定价:30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前 言

本书所说的“近代日本”，是指 1868 年至 1945 年的日本。

在这七十余年中，日本经历了“大起大落”。所谓的“大起”，是指日本从一个“蕞尔小国”，变成为世界的强国之一；所谓的“大落”，是指一度不可一世的“大日本帝国”，最终又变成了反法西斯盟国的“阶下囚”。日本这七十余年的历史验证了一个客观真理，那就是“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自身也不能获得解放”。

本书是对上述日本七十余年对外关系的回顾。由于近代日本对外关系的主线，是自明治初年形成的东亚战略和政策。日本的东亚战略体现在具体的政策上，而政策则形成了战略取向。两者是相辅相成、相为表里的。因此，本书将之作为主题和书名。为了便于了解本书的基本内容，现将书中的梗概说明如下：

一、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是国家行为。近代日本东亚战略和政策的行为主体，是近代的天皇制政权。按照战前《大日本帝国宪法》的明文规定，天皇是国家的主宰。内阁（政府）是天皇的“辅弼”机构；军部（一般是指参谋本部和陆海军部的首脑层）是直接隶属于天皇的“帷幄”机构。以天皇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，对近代日本东亚战略和政策的形成及其后果，负有不

容推卸的责任。

二、日本东亚战略和政策的思想根源,是日本的“神国观念”。这种观念认为,日本是“天照大神”的国家,理应主宰世界,各国皆当匍匐称臣。“神国观念”是非理性的历史沉淀,它是日本统治阶层麻痹国民的“鸦片”,也是近代日本国家统治的政治基础。近代日本盛行的极端“国家主义”和“日本主义”,实际是这种“神国观念”的变种。它不仅妨碍了日本国家和民族的自我认识,而且使之难以同东亚各国形成平等互利的关系,也难以同周边国家构筑和谐的国际社会。

三、日本东亚战略和政策的根本目的,是企图在东亚建立以日本为主宰的“大日本帝国”(其所谓建立“大东亚共荣圈”说法,不过是对亚洲和世界各国的欺骗)。这是近代日本国家战略的追求,也是近代日本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。其本质是在政治上实施殖民统治,在经济上实施掠夺和占有,在文化思想上实施奴化。而基本手段则是以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为主。

四、就日本国家东亚战略和政策的重点而言,大体经历以下四个阶段:

(一)“失之欧美取偿于东亚”的阶段(1868—1879)。在此期间,日本国内确立了军事、封建的近代天皇制政权,并通过出兵台湾、向中国索取战争赔偿,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及强行占有琉球等,实现了明治初年所确定的“布国威于海外”的战略方针。

(二)“大陆政策”的形成与吞并朝鲜阶段(1878—1910)。在此期间,日本极力扩张军备,并拟定了旨在分割中国的战争《策案》,随后通过“甲午战争”,控制朝鲜、割占辽东半岛和台湾。但在“三国干涉”之下,被迫退出辽东。于是,又通过日英结盟战胜

沙皇俄国,重新攫取辽东半岛,并于1910年实现了“合并韩国”的战略目的。

(三)霸占“满蒙”、在中国占据“优势地位”的阶段(1911—1933)。在此期间,日本政府把侵略矛头集中指向中国东北,并通过改订日英同盟,提升其东亚战略目标,随后又与沙皇俄国签订同盟协约,划定各自在“满蒙”的势力范围。进而则是对华提出“二十一条要求”,以期全面控制中国。时至1931年,日军终于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,迅速占领中国东三省,并扶植伪“满”傀儡政权,以长期霸占中国东北。

(四)蚕食华北、建立所谓“大东亚新秩序”的阶段(1933—1945)。在此期间,日军蚕食华北连连得手,并认为主宰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。于是,通过挑起全面侵华战争,并与德、意法西斯国家结盟,拉开了所谓“大东亚圣战”的序幕。一时之间,日本法西斯势力猖獗,席卷东亚大陆和南洋诸岛,妄图建立由日本主宰的“新秩序”。但是,日本法西斯的野心激起了中国和东亚各国更为强烈的反抗,而且激化了国际列强之间的矛盾。1942年世界形成反法西斯同盟,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最终走向了失败。

本书以日本的外交文献为主,是按照时间顺序论证的。具体揭示的,是日本政府在上述不同时期的决策和战略。这在日本某些势力依然歪曲和掩盖历史真相的今天,让他们的前人出来作证,当是具有现实意义。

人们有权利了解历史的真相;人们应该知道历史的真相。著者相信:人们可以从中有发现,有所感悟,有所思考。

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成败,取决于它的政府是否能够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和政策。

著者希望日本执政的政治家转变思维,为了日本的国家和民族,正确地认识历史,为中日关系造福,为日本与东亚各国的关系造福。

2005 年 8 月



作者简介

米庆余,1938年生,河北省玉田县人。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日本史学会学术顾问。主要著述:

《日本近代外交史》,《明治维新——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》,《日本西南战争》,

《日本的民权运动》,《琉球历史研究》;监修《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》;主编《日本百年外交史论》,《近现代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研究》,《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》;合著《日本史》,《日本近代化研究》,《日中文化传统与近代化的比较》。

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。

目 录

前 言	(1)
序 章 日本的神国观念与东亚	(1)
一 日本的神国观念与大国意识	(2)
二 神国观念与“华夷秩序”的碰撞	(10)
三 丰臣秀吉的“大日本”构想	(26)
四 德川时代“统治宇内”的思想	(35)
第一章 “失之俄美取偿于东亚”	(47)
一 明治初年的战略方针	(47)
二 “征韩论”的泛起与实施	(53)
三 对华首次立约与出兵台湾	(64)
四 强行占有琉球王国	(74)
第二章 “大陆政策”与日清战争	(102)
一 扩大对朝鲜的侵略	(103)
二 日本“大陆政策”的形成	(108)
三 “甲午战争”与《马关条约》	(120)
四 日本帝国在侵略中膨胀	(138)

第三章	日俄在东北亚的矛盾和角逐	(149)
一	日俄在东北亚的矛盾与激化	(150)
二	日英同盟与对俄战争	(162)
三	日俄《朴茨茅斯和约》	(183)
四	对外矛盾与“攻势国防”	(196)
第四章	确立对东亚的“优势地位”	(208)
一	东三省条约与吞并朝鲜	(208)
二	日俄联手分割“满蒙”	(227)
三	策划“满蒙独立”与二十一条要求	(251)
四	“西原借款”与日中军事协定	(291)
第五章	建立伪“满”政权与蚕食华北	(309)
一	“满蒙政策”的用心与目的	(310)
二	阴谋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	(320)
三	建立伪“满”傀儡政权	(338)
四	蚕食华北与何梅、秦土协定	(351)
第六章	统治大东亚的妄想与失败	(361)
一	《国策基准》与全面侵华战争	(361)
二	日德意同盟与对美战争	(379)
三	所谓“大东亚新秩序”的真相	(394)
四	“大日本帝国”的崩溃	(399)
结 语		(415)

附 录 日本东亚战略和政策年表	(42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后 记	(511)
-----------	-------

序章 日本的神国观念与东亚

皇大御国，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，
世界万国之根本。若善于治理其根本，
则全世界可悉为郡县，万国之君长可悉
为臣仆。

——1823 年佐藤信渊《混同秘策》

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写道：“基于日本国家体制特性的神国观念乃至民族性自恃，建国以来一直一脉相承地在国民的胸膛中回荡着。”^①21 世纪之初，当时的日本首相森喜朗依然公开宣称“日本是神的国家”。此事令世界舆论哗然。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三番五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，声称这是日本的文化传统。人们在难以理解的同时不得不思考：这是何种意识？这种意识及其支配下的种种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？这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。

① 丸山真男著、王中江译：《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，第 270 页。

一 日本的神国观念与大国意识

日本的神国观念源于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,后经统治者的加工整理,集中地表现在《古事记》和《日本书纪》中。

《古事记》成书于712年,据说是奉天武天皇之命撰写的。内容由上、中、下三卷组成。上卷是神代,从天地初开至神武天皇诞生;中卷由神武天皇东征写到应神天皇;下卷是写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。

上卷约占全书的30%左右,其中包括国土生成、天照大神的出现以及大国主命奉献国土和天孙降临、治世等神话。粗略统计,大约中译2万字左右的上卷,各种“神”的名称反复出现了635次。这些故事所体现的思想是: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,天皇的权威高于一切,“皇统”即“神统”,反抗“皇统”就是反抗“神统”,这不仅是逆天行事,而且是天威所不容的。这也是日本古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。

《古事记》的宗旨在于昭显“邦家之经纬,王化之鸿基”。^①而其真正的意义,则是在展开神话世界的同时,为日本制造了神国观念。后世的许多思想都是基于神国观念而来的。如本居宣长(1730—1801)著述的《古事记传》,则将神国观念发挥到了极致的程度。他认为“世界上有许多国家,但由神祖直接生出的,只有我日本国”。他把日本说成是天照大神(太阳神)的国家,因而是世

① 太安万侣编撰、周作人译:《古事记》,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,第16页。

界万国的本源,是最优秀的,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,“世中万物皆变,惟我天皇的皇统永远不变。”^①

《日本书纪》成书于720年,它是继《古事记》之后的第一部“国史”。据称是由天武天皇皇子舍人亲王为总编而完成的,实际可能乃是《古事记》的编者安万侣(也被记作太安万侣)。

《日本书纪》有别于《古事记》,关于神代的描述只有第1卷和第2卷,也是古代神话的传承,称为“神代卷”。从第3卷开始到最后的第30卷,讲的是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的历史事件,称为“人皇卷”。在这些传说与历史的叙述中,尤以对朝鲜诸国的记载为多。如:

神功皇后9年条,借新罗王之口说:“吾闻东有神国,谓日本;亦有圣王,谓天皇。”^②

神功皇后46年条,借卓淳(即任那)王末锦旱歧之口,转述百济人的话说:“百济王闻东方有日本贵国,而遣臣等,令朝其贵国。”^③

神功皇后51年条记载,派遣使节千熊长彦等赴百济,谓之曰:“朕从神所验,使开道路。平定海西,以赐百济。今复结好,永宠赏之”,百济王父子一起叩地说:“贵国鸿恩,重于天地,何日何时敢有忘哉。圣王在上,明如日月,今臣在下,固如山岳,永为西蕃,终无贰心。”^④

① 《玉茅百首》,见朱谦之著:《日本哲学史》,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,第107页。

② 坂本太郎、家永三郎等校注:《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67 日本书纪 上》,岩波书店1978年版,第351页。

③ 同上书,第353页。

④ 同上书,第359页。

应神天皇3年条记载,由于“百济辰斯王立之失礼于贵天皇”,日本遣使“责让其无礼状”,于是“百济国杀辰斯王以谢之”,日使“另立阿花为王而归。”^①

应神天皇28年条记载,“高丽王遣使朝贡”,其上表曰“高丽王致日本国也。”太子菟道稚郎子读表“怒之,责高丽之使,以表状无礼,则破其表。”^②

仁德天皇17年条记载,“新罗不朝贡。九月,日本遣使往新罗询问为何不朝贡。于是,新罗人惧之,乃贡献绸绢一千四百六十匹及种种杂物,并八十艘。”^③

上述记载在很大程度上是编纂者对交往事件的渲染和夸张。

除以上列举之外,《日本书纪》中还有许多关于朝鲜各国因慕“圣朝圣化”而经常“朝贡献物”以及“归化日本”的记载。

就历史事实而言,兴起于公元3世纪末的大和国,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统一日本。4世纪中叶,大和国曾向朝鲜南部扩张势力。当时朝鲜半岛正值高句丽、百济和新罗三足鼎立时期,日本利用百济借助外力对抗高句丽和新罗的心态,于4世纪60年代入侵新罗。随后于391年破百济和新罗,并将两国视为自己的“臣民”。此后,朝鲜半岛处于日本的军事压力之下。但古代的朝鲜半岛各国并未从属于日本,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过主从关系,而是日本统治者企图统治朝鲜半岛的神国意识在作祟。它表明日本的神国观念已经派生了对外的大国意识,《日本书纪》已经在描述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秩序。

① 坂本太郎、家永三郎等校注:《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67 日本书纪 上》,第365页。

② 同上书,第377页。

③ 同上书,第397页。

进入5世纪以后,大和国的统治者先后有赞、珍、济、兴、武等五人。《宋书》称之为“倭五王”。“倭五王”在对外交往方面采取“远交近攻”政策,即积极与中国的东晋、刘宋、齐、梁各朝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。特别是倭王多次主动向中国皇帝要求封号。如:

438年,倭王珍遣使刘宋,自称“使持节、都督倭、百济、新罗、任那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倭国王”,要求宋文帝刘义隆予以正式认同。但文帝只承认其为“安东将军、倭国王”。^①在此之前的420年,宋武帝刘裕曾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,其位高于倭王。倭王珍提出上述称号要求,有与百济王一比高低之意,但一时没有得到刘宋皇帝的认同。

451年,倭王济遣使朝贡,从宋文帝那里得到了“使持节、都督倭、新罗、任那、加罗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、安东将军”的封号。^②这一封号与倭王珍渴望的如出一辙。

478年,倭王武(学界认为是雄略天皇)遣使上表,自称“使持节、都督倭、百济、新罗、任那、加罗、秦韩、慕韩七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倭国王”。^③此时大和国已经统一日本,倭王武在国书中言称“自昔祖祢,躬擐甲冑,跋涉山川,不遑宁处。东征毛人五十五国,西服众夷六十六国,渡平海北九十五国”等^④,这种带有夸张性的炫耀,实际是希望借助刘宋的“帝德覆载”以支持他的自称。但是,宋顺帝还是从其自称中去掉了“百济”一项。

“倭五王”时代之后,中日国交中断,直到推古天皇与圣德太

① 见汪向荣、夏应元编:《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》,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31页。

② 同上书,第31页。

③ 同上书,第31页。

④ 同上书,第32—34页。

子摄政时代,才同隋朝恢复交往。《隋书·倭国传》记载:

“开皇二十年〔600年〕,倭王姓阿每,字多利思比孤,号阿辈鸡弥,遣使诣阙。上令所司访其风俗。使者言:倭王以天为兄,以日为弟,天未明时,出听政,跣趺座,日出便停理务,云委我弟。高祖〔隋文帝〕曰:此太无义理。于是训令改之。”^①

隋大业三年(607年),日本圣德太子以小野妹子为使节出使中国。《隋书·倭国传》记载:

“大业三年,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。使者曰:‘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,故遣朝拜,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习佛法。’其国书曰:‘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’云云。帝〔隋炀帝〕览之不说,谓鸿胪卿曰:‘蛮夷书有无礼者,勿复以闻。’”^②

上述两则记载,说明日本同隋朝恢复交往之际,其大国意识已经非常明显。一则自称“倭王以天为兄,以日为弟”;二则自称“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”。这说明随着日本的统一和君权的强化,日本已经有了区别于中国的“天下”意识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:“圣德太子要和隋朝缔结对等的国交,这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新纪元”^③。

608年,隋使裴世清与小野妹子一同赴日,据《日本书纪》所载,裴世清向日本天皇递交的国书如下:

“皇帝问倭皇: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〔小野妹子〕等,至具怀。朕钦承宝命,临仰区宇,思弘德化,覃被含灵,爱育之情,无隔遐迩。知皇居海表,抚宁民庶,境内安乐,风俗融合,深气至诚,远修朝贡,

① 见汪向荣、夏应元编:《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》,第44页。

② 同上书,第46页。

③ 木宫泰彦著、胡锡年译: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,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,第53页。